

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读王日根教授《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

章寿伟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107-02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代。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重要变革上,而且也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应对能力上,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社会治理观念与政策走向。尤其在沿海地区,这种状况表现特别突出,亦颇具代表性。王日根教授的新著《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题成果,纳入陈支平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对这一问题展示了其新颖的视角与见解。

该书由绪论、七章及结语组成,共计39万字。在回顾了海洋观念与传统政府治边观念演变及特点后,作者分别从明清海防政策与阶段性、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明清海洋移民政策演变、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其中第一、二章分别从海防的形势、任务及效果等方面来论述明代、清代的海防政策与阶段性,第三、四章则关注的是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从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来考察这些政策的形成及影响。第五、六章讨论了明清时期的海洋移民政策的演变。第七章则是从海洋管理的出发点,政策的执行与影响等方面阐明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明清海疆问题的研究大都是单一地从经济、海防或移民作考察载体,而本书作者则认为:“海防政策是明清海疆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都是海防政策

的派生政策,或者说直接受到海防政策的影响,海洋贸易政策与海洋移民政策必须随着海洋防务的变化而变化,因应海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第33页)。因此,本书考察海疆则综合上述三方面内容进行,并认为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书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以下深刻印象:

首先,书中论述全面、论证缜密。作者从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三方面进行论证海疆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样的论证有助于全方位地关注政策与社会互动。如剖析中外各种势力对于海防建设面临的种种困难时,从国内的种种走私商人、海盗、山寇、陆寇,到倭人、红毛贼、英吉利等国西方殖民者。方法上以划阶段、分类型对于海防进行详细剖析、缜密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在通过深入探讨水师建立的目的、布防与任务基础上,作者说以往人们抨击鸦片战争中清水师何如不堪一击时,但却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支“以查缉海盗为主的军队担负对抗世界上头号海军的入侵任务,无异于以卵击石”(第166页)。作者强调海防建设中,官民之间关系处理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海防成效。明初期所建立的防卫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利益,然而随着越来越极端的海禁政策,招惹了愈加强烈的反弹,“官方海防建设收获了敌对力量迅速膨胀的苦果”(第72页)。而戚继光的“募兵制”,俞大猷等将领对土著乡

* [收稿日期]2006-02-09

民力量的调用,有力地抗击倭寇海盗等势力,都表明了其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努力。因此,“官民力量的相互结合是平定倭寇的重要保证”(第85页)。

其次,作者在论述了海疆政策的时候,不仅注意到了不同时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而且尤其注意到了政策的执行效果,这样就避免对历史上海疆政策作出简单的否定或肯定,从而使得论断更加科学。如在禁止贸易上,政府有“片板不许下海,艚舳巨舰反蔽江而来,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作者认为政策与政策的执行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第251页)。又如对于明代海禁政策,作者说:“随着吏治的腐败,海禁政策更是被执行得百种千样,或阳奉阴违,或私开利窦,或怠于海防建设,失去了对沿海局势的控制能力”(第486页)。海禁是明清时期海洋管理的基调,地方和中央,地方官吏与朝廷大臣之间的意见也是不统一,所以“在实际的海禁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是呈现出摇摆状态,禁海中有开海,禁海时亦时开时严”(第499页)。在沿海不同地方,地方官在执行政策时也宽严不一,矛盾丛生。

再次,书中对于以往一些观点的重新评价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指出:中国长期以来经济与文化的领先发展使自己形成了“天朝大国”的自我陶醉意识。朱元璋在清除他的敌对残余势力时,第一次拉开了陆上军事力量与海上军事力量对抗的序幕。尽管朱元璋竭尽最大努力,在海洋区域沿用卫所制度,建立烽墩制度和水寨制度,迁徙沿海岛屿上的居民等等,但所有这些似乎并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到了他的儿孙辈,新的敌对势力又不断累积,其建立的卫所等制度也不断孕育出许多新的弊端,因而明政府的许多努力收获了苦果,敌对势力变得

更强大了。明朝中期倭寇的猖獗,已不仅仅是日本国内斗争的副产品,中国国内的诸多矛盾都汇集到倭寇之祸上。倭患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物,不断拷问着明政权的承受力。明政府和各级地方官员在慌乱中失掉了平静的心态,一直以一种疲于奔命的情绪,制定着偏严或过松的政策,作为王朝的子民时常陷于欲罢不能的境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第32页)。作者认为:明清的许多皇帝“或是把海疆的管理看做陆地防卫的延伸,一味地照搬陆地防御的一套机制,在西北边疆尚设立理藩院一类的机构,在东南沿海,向无专门机构。因为治理的多为汉人,政策的落脚点也不是如西北民族地区‘因俗设官’,‘因俗而治’,而是在东南区域推行了大陆化、集权化的政策”(第34页)。例如:过去简单地以“闭关”或“开放”来判定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都是将它视为一成不变的政治行为,因而无法揭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进的复杂轨迹。又如谈到有人认为开海是沿海官员从地方利益出发而坚持的观念时作者指出“我们稽诸史料,看来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就顽固地坚持禁海”(第500页)。

尽管明清海疆政策是建立在偏重朝廷维持和忽视沿海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也遭到民众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而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脉络仍得以延续。作者说,总览海洋政策,其中存在着逐渐合理化的过程,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即海疆政策科学性的缺乏。总之,该书对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我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顽强而缓慢的发展原因,对于推进海洋史学向纵深发展与科学海疆政策的制定,都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